

目錄

TANG
RUSSIA
OUTSIDERS
WAR ZONE
DIPLOMATS
CHINA
STRANGERS
INDIVIDUAL
ECONOMY
WORKPLACE

引言 6

一 猶人來華 始自唐朝 16

二 哈爾濱：滿洲的猶太人首都 34

三 上海的嬗變：1840-1941 72

四 二次大戰：逃出地獄 108

五 外交官：那些拯救猶太人的人 138

六 離開中國，返回「祖家」 172

七 邂逅北京 42 年 204

八 回到大陸：上海、北京、哈爾濱 226

九 25 載過去：經貿往來興旺，
和平仍付闕如 272

十 安穩的避風港 310

鳴謝 358

參考書目 362

NEW CENTURY
HARBIN
CITIZENS
SEGREGATED AREA
SAVIOURS
ISRAEL
FRIENDS
SOCIETY
DIPLOMACY
HOME

引言

「我相信神，也信天意。有時候，如果我們運氣好，可以看到神引路的手。在華猶太人的故事，是我們交上好運的一例。我們看到神引路的手，也看到了天意。」

香港猶太教莉亞堂（Ohel Leah Synagogue）Asher Oser 拉比

在耶路撒冷一所神學院，5名20來歲的中國婦女正全神貫注地學習希伯來語和猶太教義，好為歸宗猶太教做好準備。2016年2月，他們從老遠的中國河南省開封市長途跋涉，終抵達以色列。開封市一共有19位中國人完成「還鄉」（希伯來語「Aliyah」，即旅居外國的猶太人終返回以色列祖家）之旅。5名年青女子是漢人，外觀上與中國13億同胞無異，但在她們的孩提時代，她們從父母口中得知，自己與鄰家小孩並不一樣——她們的祖先在超過1,000

年前來到開封，在命運安排下，留了下來，生了根，而她們正是猶太祖先相隔千年的後裔。經過3年多鏗而不捨苦苦懇求，以色列政府終於點頭，容許她們還鄉認祖歸宗——前提是：必須先通過國家首席拉比院（Chief Rabbinate）認可的歸宗程序，才算是官方認可的猶太人和以色列公民。

這19位還鄉者，是今天的以色列、猶太人和中國三者之間最戲劇性、最看得見的聯繫。他們的祖先在中國唐朝（618-907年）時代來到中土，尋找商機——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先進的國家。那些早年的猶太人，只消幾代人，便被一個沒把他們當作異族外民的文化所同化，至少不至於因離棄本教而感內疚（若是在信奉基督教的歐洲國家，那可大不相同）。他們享受與中國其他民眾相同的權利，其中有些通過朝廷的殿試，當了官；有些成了富商、農民或能工巧匠；有些成為治病救人的大夫。他們充份與當地文化融合，晉身社會中層甚至上層。這些了不起的成就，再加上與中國女子通婚，大大淡化了他們的猶太人身份。他們與留在歐洲或中東族親的聯繫，隨著年深日遠而逐漸斷絕；他們的希伯來語、猶太文化和歷史、猶太教義和禮數等，都逐漸淡忘、丟失。到了19世紀初，開封最後一位拉比仙逝後，猶太社——沒有再安排替補人選，開封猶太會堂漸成門堪羅雀的一堆磚頭。

相隔多個世紀，自1840年代起，中國迎來新一批猶太移民。他們跟隨西方殖民列強（主要是英國）的堅船利炮而來，逼迫滿清政府割讓香港、開放東部沿海多個通商口岸。新時局帶來新的洋人

社，就有做生意的新商機。一如他們遠在唐朝的先輩般，這一波的來華猶人是衝著新商機而來的。透過進口鴉片和紡織品，出口茶葉、蠶絲和菜油，他們變得非常富有；後來涉足房地產、製造業和運輸業，更讓他們富可敵國。香港、上海、天津和其他通商口岸的新來者建立起類似在歐洲建立的社區：他們興建猶太會堂、學校、公墓和社會機構；請來拉比，帶領他們的宗教生活；在族內找結婚對象；與當地中國人的互動少之又少。在華猶太人以塞法迪為主，他們源自巴格達，後來移居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散居那裡的不同城市。

自 19 世紀起，另一猶太社——來自俄羅斯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抵達中國，這次是東北滿洲地區。他們的活動，有助哈爾濱發展成一個國際都會。到了 1920 年代，那裡的猶太社規模達到歷史高峰的 2.5 萬人。和他們在上海和香港的同胞一樣，他們興建猶太會堂、學校和其他社會設施，延聘拉比帶領宗教生活。他們維持著從俄羅斯、東歐帶來的宗教生活和法律傳統。

第三個來到中國的現代猶太社，是從納粹統治下的歐洲逃出來的難民。他們自 1930 年代中開始，陸續東來，到 1941 年 6 月德國進犯蘇聯，切斷猶太人最後的逃亡路徑前夕，已經達到 3 萬人。當世界上大部份國家都對猶太人關上大門時，上海卻為他們提供避難之所。這是本書中最讓人感受到英雄氣概、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章。不少人透過中國、日本（或許還包括滿洲國）一些駐外官員違反上級禁令所簽發的簽證，得以避秦東來。由於管理上海

公共租界的外國官員放行，難民得以進入租界。中華民國政府和（入侵的）日本帝國政府都歡迎猶太人到來。雙方都劃出專門區域，讓猶太人安頓、發展。由於中華大地上烽火處處，戰火越燒越烈，上海的「家」也不能倖免，但單是「猶太人專區」的構想，已足以反映兩個政府對猶太人的尊重。別忘了就在當時，納粹德國和它歐洲的盟友正落實針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

在上海，難民居住條件惡劣，環境擁擠，與數千計同樣是難民、在生存邊緣掙扎求存的中國人共處於方寸之地。儘管自己的生活已經夠苦了，但對這些突然出現在自己當中的陌生人，上海人仍以善出發，以禮相待。自 1941 年起，佔領上海的日本人拒絕配合納粹盟友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要求。這是故事中最讓人嘖嘖稱奇（或者可以說奇跡）的一章。那些尚留在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的少數猶太人每天惶恐度日，生怕隨時被抓、被送進死亡集中營；已經逃到中國或日本的幸運兒則無此威脅。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日本佔領上海公共租界期間，以擁有「敵國」（盟軍國家）護照為由，扣留了在華猶太人（而不是因為他們的猶太種族身份）。1937 至 1945 年間的太平洋戰爭，奪去無數軍民性命，但由於猶太人不是殺戮目標，大部份都能活下來。對他們來說，住在上海、天津或神戶，要比住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或維也納安全得多。

二戰結束之後的 10 年，幾乎所有在華猶太人（包括逃難而來的和旅居已久的）都紛紛離開中國。他們是被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內

戰的炮火、讓人窒息的通脹，以及 1949 年奪取政權後新中國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私有企業國有化、用懷疑的敵意眼光看待外國人等）所嚇跑趕跑的。離去的猶太人選擇移居美國、澳洲、加拿大、南非，以及 1948 年 5 月成立、讓所有猶太人得以「還鄉」的新國家以色列，只有少數猶太人回到俄羅斯或者其他他們所來自的歐洲國家。有為數更少的猶太人決定留在中國，為那個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新國家奉獻一生。唯一的例外，就是屬於英國殖民地、不受內地政權變色波及的香港：那裡的猶太社 仍如 1842 年建立殖民地以來般，做自己的生意，過自己的宗教和社會生活。

1976 年新中國至高無上的領導人毛澤東逝世、1978 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國策以後，中國大陸的大門重新打開，歡迎外國投資者、專家學者、教師、工業家和商人到來。猶太社區重新建立 首先在北京，繼而在上海，並隨著經濟發展的步伐而遍及其他城市。這些猶太社 一旦達到一定規模，就會延聘拉比，帶領其宗教和社會生活的重建，就如在他們所來自的國家生活時那般。據估計，到了今天，內地已有約 1 萬名猶太人，另有 5,000 至 6,000 人居於香港。每年有數以萬計猶太人以遊客、商人和學生的身份來華。新中國並不承認猶太教為「認可宗教」，故仍未歸還猶太社 於 1949 年一直使用的會堂，但容許他們過自己的宗教和社會生活。政府眼睛時刻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發現他們與基督徒或伊斯蘭教徒不同：他們從不向本地華人傳教。當地社會（無論是官員或公眾）沒有反猶情緒、沒有反猶活動。因此，寓居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猶太人，較諸寓居巴黎、馬賽和多個歐洲

城市的更感安全，也更安心。他們可以頭戴「基巴」（kippah，無邊小圓帽），而不怕被人譏笑，甚至攻擊。中國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他們在這裡找到祖家找不到的商機。

以色列成立未幾，就希望與新中國（當時尚未取得聯合國成員國資格）建立外交關係，但一等就等了 42 年 直到 1992 年 1 月，以色列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 年取代「中華民國」得到成員國資格，並同時取代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正式建交。為甚麼要那麼久？因為毛澤東選擇與「革命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站在同一陣 。北京把以色列形容為「錫安主義實體」（「錫安主義」也稱「猶太復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工具」。

1979 年的中越戰爭，讓中國明白解放軍武器的落後，於是向外求索，終找到以色列幫忙，更新自己的軍火庫。從此，中以雙邊貿易的大門便打開了。不過，這貿易必須在檯底下進行，因為檯面上，北京一貫支持阿拉伯世界對抗以色列的事業，跟以色列做生意與上述立場相違背；再者，蘇聯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支持者，考慮與以色列建交，不得不投鼠忌器。1990 年代初，蘇聯帝國分崩離析之後，中以建交一事變得簡單多了。

1992 年以後，中以關係的發展道路讓世人瞠目結舌。2016 年，中國成為以色列最大外來投資國之一。以色列數以千計高科技初創企業需要大量資金，但商業風險高，中國的投資是這些風險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國成為以色列全球第三大、亞洲最大貿易夥

伴；中國建築企業在以色列興建大型基建項目，其他中資公司收購了不少以國企業。以色列政府歡迎這些投資，以平衡來自歐美的資金，並贏得中國這個全球超級大國的友誼。

可是，以色列國內並非一面倒歡迎來自中國的資金。有批評說，對大部份以色列企業而言，中國市場並未對應地向以色列開放；有人懷疑聽命於中國政府的中國企業到以國投資的動機——中國會否向以色列的潛在敵國出售以國最寶貴的資產：高科技？別忘了北京選擇與諸如伊朗、敘利亞、也門等痛恨以色列的國家建立緊密的軍事和商業關係。再者，建立了 25 年的外交關係並未為以色列帶來和平回報——在化解中東地區衝突一事上，北京並未扮演積極角色，也未運用其對伊朗等阿拉伯國家的強大影響力，斡旋出一個和平共處的安排。

在世界猶太人歷史中，在華猶太人的故事讓人愉悅。整體而言，猶太人的故事悠長、複雜，充滿傷感。在附設於柏林「大屠殺紀念館」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地下「信息處」（Ort der Information）的牆壁上，蝕刻了納粹大屠殺倖存者 Primo Levi 一句充滿哲理的話：「它發生過，所以，可以再發生——」Levi 是一位化學家、作家，寫了一本追憶自己當年身為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囚徒的歲月的書。1987 年，時年 67 歲的他在意大利都靈市（Turin）一棟 3 層高房子墜下致死，驗屍官確認是自殺。Levi 患有抑鬱症，部份是因為被囚期間造成的創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大屠殺倖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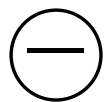
Elie Wiesel 下了這樣的結論：「Primo Levi 死於奧斯威辛 40 年之後。」

和上述的陰沉背景相比，在華猶太人的遭遇可謂天上人間。無論在中國人統治時期還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統治時期，無論是國民黨當政還是共產黨當政，都從未吃過反猶主義的苦頭。在華猶太人於 1930 年代在哈爾濱遭受的攻擊，是俄羅斯法西斯分子（夥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幹的——他們把固有的、對猶太人的偏見帶到中國來。自唐朝起，歷代中國皇朝都善待猶太人，猶太人享受無異於中國老百姓的權利，可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英國人自 1842 年來華一個世紀以來，以及 1978 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華猶太人中，做生意的業務興旺，在其他領域的也各有成就；他們可以按自己的意願組織社區。日本侵華期間，在華猶太人與當地華人一樣，受盡苦難；國共內戰期間、新中國立國以後，和其他在華外國人一樣，猶太人決定離開中國。但在兩次重大歷史波折中，猶太人從未被針對，單獨加害。

潘光（中國研究有關猶太人歷史的泰斗級人物）稱：「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同屬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列——有很多共通之處——比如，兩種文明都相當重視家庭聯繫和教育的作用。雖然他們都吸收了不同的異域文化，但是其核心卻一以貫之，從沒改變過。」（註：潘光：《猶太人在中國：傳奇、史實和透視》，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官網）

香港「猶太教莉亞堂」(Ohel Leah Synagogue) 拉比 Asher Oser 說得更有意義：「我相信神，也信天意。有時候，如果我們運氣好，可以看到神引路的手。在華猶太人的故事，是我們交上好運的一例。我們看到神引路的手，也看到了天意。」

Oser 又引述了 Salo Wittmayer 男爵的一句話。Wittmayer 是 20 世紀其中一位最出色的猶太歷史學家。他在 1895 年生於當年奧匈帝國加利西亞地區 Tarnow 鎮（今天歸屬波蘭）。在 Wittmayer 男爵的孩提時代，該鎮有 1.6 萬名猶太人，但大屠殺之後只剩 20 人。男爵存活下來，因為他在 1920 年代已移居紐約，後成為一名教授。二戰中，他家人盡失。男爵在 1975 年一次訪問中說：「受苦受難，是（猶太人）命運的一部份。一而再的喜樂，以及終極的救贖，亦復如是。」



第壹章

猶人來華 始自唐朝

From
TANG

To
NEW
CENTURY

猶太人首次大規模遷移中國，是第八世紀的事，那時正處中國的唐朝（618-907年）。那時，論版圖、論文化先進程度，中國均傲視全球。猶太人有從陸路經中亞而來的，也有從海路抵達中國東南沿海港口（主要是廣州）的。在他們遷移路線途經的不同城市，都有猶太人選擇就地安頓下來。這些城市包括西安、洛陽、開封、廣州、杭州、寧波、泉州、北京和南京。促使他們移居中國的原因，與當年和今天其他外國商人所做的，並無二致：互通有無，從中取利。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猶太人來華的時間可能更早，有說甚至早至周代（前1045 - 前256年）——儘管後一說至今未有實質考古或文獻支持。

唐朝時的中國，是世上最大的經濟體和貿易大國。它的年生產總值約佔同期全球生產總值的一半；它大量出口包括茶葉、絲綢、漆器、瓷器和銀器在內的商品。廣東省首府廣州，是當時主要的商港。面對龐大的貨流和當中蘊藏的巨大商機，數以千計的外商（包括猶商）蜂擁而至，冀可從中分一杯羹。在華外商開設他們自己的餐館、社會館，以及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唐朝時的長安城（約相當於今天的西安市）是京城所在，人口（包括猶太人）約200萬，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長安不僅人口總量大，種族、文化也極為多元，以宗教為例，

就包括佛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當然還有猶太教。

定居開封

北宋（960-1127年）年間，首批來華猶太人定居於當年稱「東京」、今天屬河南省開封市的地方。東京既是天朝「東部首都」，人口也有相當規模——超過100萬。一如長安和廣州，常住人口中有不少外國人，包括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同時也有猶太人。學者們大多相信這時期在開封定居的猶太人都來自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所在地區。有唐一代，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經濟體和貿易強國：它是軍用和民用鐵器的主要生產國，它發行人類史上首批政府公債；滿載鐵器、寶劍、絲綢、絲絨織品、瓷器等的中國商船遠航東南亞、印度、中東和東非。這一切，都為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外商創造了上佳的經商環境。

「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潘光和王健兩位教授在《猶太人與中國》裡說：「猶太人來到開封後，受到宋朝當局的友好接待，被允准歸依中國，可保持本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並定居在開封。此後，他們在居住、遷徙、謀業、就學、土地買賣、宗教信仰、通婚等諸方面均享受與漢族同樣的權利和待遇，從未受到歧視。」（註1）在這種氛圍下，開封猶太社漸漸興旺起來，猶太人成為富人階層，連帶猶太教也有長足發展：1163年，他們建立

以色列猶太會堂（synagogues）；1279年（中國已進入元朝），在當地政府支持下，他們重建、擴建該會堂，新會堂佔地達1萬平方米。「到了明代，開封猶太社進入其鼎盛時期，據估計，當時整個社團已有500餘家庭，約4,400至5,000人口。當時開封猶太人中有經過科舉之路進入朝廷或到州縣當官的，有通過經商辦實業而成為富商巨賈的，有技藝高超的工匠和勤勞致富的農夫，也有少數醫師和職業神職人員，大多在經濟、文化上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中上階層。」（註2）

中國在明代（1368-1644年）見證了歐洲針對猶太人的幾波最嚴酷的迫害。繼1492年發生在西班牙、1497年發生在葡萄牙的驅逐浪潮之後，有數以萬計猶太人陸續被奧地利和德國驅逐出境。基督教國家的孩子被灌輸猶太人要對耶穌的死負責的觀念。由於當時中國幾乎不存在基督教，在華寄居的猶太人毋須面對基督徒的仇恨，可以享受他們留在歐洲的同族人不能享受的權利和自由。

在開封博物館「古代開封猶太歷史文化」陳列室裡，展示了明朝弘治2年重修的清真寺碑，以及「尊崇道經寺記碑」和「祠堂述古記碑」兩塊石碑。據《僑園》（一份有關華僑事務的期刊）稱，前述弘治2年寺碑的碑文「是開封猶太人修建的一座清真寺中的3塊石碑。碑文內容不但記錄了開封猶太人宗教活動的遺存，還包含有中國古代猶太人當時的政治地位、社會職業和生活情況等方面的記錄。」（註3）

開封猶太人作為一個社 區，自身非常成功；在融入中國社會生活和發展專業方面，他們同樣成功，以致對他們猶太人身份的維持構成威脅。為了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他們採用漢人姓氏、在生活中使用漢語（希伯來語只在進行宗教活動時使用）。起初他們還能堅持族內通婚，但到了明朝，猶太男子開始娶漢人女子為妻；他們穿戴漢族服飾（絕大多數遷移中國的猶太人都是男性）。

沒落和災難

1642年，明朝爆發農民動亂，並發展至武裝暴動。開封城被叛軍重重圍困，守城將軍命令扒開黃河圍堤，導致黃河水一決千里，開封城頓成汪洋。居於開封約4,000名猶太人淪為水鬼；猶太會堂為水所淹，無數聖經不知所終。儘管倖存的猶太人花了極大力氣，於1663年重建了會堂，又找回失落的聖經，但猶太社區已經元氣大傷——整個社區人口跌至約2,000人，僅及原來的一半。在接下來的200年，猶太社 區人口持續萎縮，原因之一，是開封城自身的萎縮。作為宋朝的京城、元明兩朝的商業中心，開封城在歷史進入清朝（1644-1911年）以後，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人口規模（跌至20萬）和商貿活動也隨之雙雙萎縮。不少猶太人選擇離開，另覓出路。此後，開封再經歷數次大水災（1841年的黃河大決堤，寫下「水淹開封八個月」的歷史）。到17世紀下半葉，開封猶太社 區已無財力修繕會堂；到19世紀中葉，會堂已然荒廢。

猶太社 區人口持續萎縮的原因之二，是明、清兩朝政府採取閉關鎖國政策，這就意味著猶太社 區無法像他們的開封祖輩一樣，與海外的猶太世界保持聯繫。在最後一任拉比（rabbi，即猶太教士）於19世紀早期辭世之後，便後繼無人——連一個具備主持宗教儀式資格的人都沒有。隨著更多猶太人融入主流華人社會，猶太人被同化的過程進一步深化。《僑園》（2016年6月號）寫道：「以後，猶太人分散居住，猶太社團就此消失。1841年猶太清真寺被夷為平地。猶太會堂最後一次被洪水毀壞後，便無人重修了。」（註4）

據潘光教授說，猶太社區沒落，主因有二：其一，他們與外界的交往被中斷長達200年；其二，他們在客居國所受的對待與在歐洲的親友迥異。「他們始終與客居地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團享有平等的權利」，中國歷代皇朝對待開封猶太人，始終如同對待其他民族般，一視同仁，從不歧視，「你只要經營有方，生財有道，同樣可以成為巨賈豪富；你只要刻苦攻讀孔孟之書，循科舉之路，同樣可以當官掌權。而歐洲的情況則正好相反，猶太人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都受到歧視。歐洲猶太人在客居地始終難以取得與主體民族和宗教同等的地位。」（註5）總而言之，開封猶太人為客居國所同化的過程，正是這個 社區沒落的過程。

正當開封猶太社區日漸式微，對猶太教感興趣的西方人士陸續來華。依仗19世紀中葉兩次鴉片戰爭打敗中國，透過其後簽署的兩份條約，歐洲列國強令中國接受列強國家的公民來華居住的權

利。這些外國公民包括了基督教傳教士，他們首次發現開封猶太人的歷史。深受約 3 個世紀以前的傳奇故事吸引，傳教士開始著手研究。1866 年 2 月，漢名叫「丁韞良」的美國傳教士 W. A. P. Martin 到訪開封，找到了破敗不堪的猶太會堂，又在一溝渠中發現會堂的一塊碑石。被指為猶太人的 8 個家庭中，6 個已和中國漢人通婚、兩個與回族穆斯林合組家庭。傳教士們的結論是：來到他們這個年代，開封猶太人已既不會聽、說希伯來語，又不會讀、寫希伯來文；已沒有進行猶太教的禮拜儀式。更重要的是：通過文化上被同化以及與當地人通婚，開封猶太人已失去了猶太人的特質。傳教士們希望重燃這些本是猶太人的同胞對《聖經》的興趣，進而向他們推介《新約》，可是開封猶太人對此無動於衷。無論如何，他們驚歎以色列的兒女能把民族的種子遷播至遠離聖地（Holy Land）的這個中國城市。另一方面，雖然開封猶太人已不再奉行他們祖輩的宗教儀式，他們也深知自己的種族背景，令他們始終有別於比鄰而居的中國人。

1900 年 3 月，44 名上海猶太人向開封猶太人寄出一封信，一方面譴責他們背棄了猶太傳統，另一方面向他們伸出恢復傳統的援手。（註 6）接著，雙方互通信息，甚至進行互訪。但基於自身財力上的掣肘，上海猶太社 無法籌措重建開封猶太會堂所需資金。

統治了中華大地逾 260 年的大清皇朝在 1911 年被一夜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中華民國。翌年，新政府與開封 7 個猶太家族簽訂有關興建一座猶太會堂所涉土地的協議；再過一年，7 個家

族以 1,300 元大洋，把近 10 畝（約 0.7 公頃）的土地賣給一個基督教教會。（註 7）後來當國民政府進行人口普查時，開封猶太家族無法出示任何足以清楚交代他們家族史的書面材料——他們只能憑記憶口述所知道的片段。

「阿利亞」的誕生

現代的以色列，於 1948 年 5 月 14 日立國。其所在土地被猶太人視為自古以來的祖家，因而也被他們視為全球猶太人今後的歸宿。那裡是以引領散居世界各地猶太族人回到以色列祖家為己任的各地「錫安主義」（Zionism，有譯「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總部。這種主義，在希伯來語稱「阿利亞」（Aliyah，意即「上升至耶路撒冷」）。因此，若開封猶太裔後人可以證明自己的猶太血統，同時向掌管宗教事務的以色列當局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猶太人，他們就可以申請移民以色列。

1949 年，中華大地變色，由宣揚無神論的共產黨一統江山。新政權只容許 5 個「官方認可」的宗教繼續存在，猶太教不在認可之列。新中國捲入韓戰（1950-1953 年），後果是遭到西方國家杯葛，具體表現為貿易禁運，冷戰持續近 30 年。這些變故使開封猶太社 無從與中國以外的猶太人世界接觸，更遑論邀請海外拉比來華，協助猶太遺民重過猶太人應有的宗教生活。那是「革命」的年代，期間，要奉行宗教崇拜，首先是不容易，有時是不可能。

中國人要獲准離開國家，可說難若登天；後來「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狂熱的「紅衛兵」無休止地攻擊各式宗教崇拜。

要到至高無上的領袖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新領導層於1980年代初落實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國策以後，與外界接觸才不再是奢望。自此，國人被允許出國工作、留學，乃至定居。根據1987年的人口統計，開封市共有159名猶太後裔，他們全部都使用漢人姓氏、全部或與漢人或與回人通婚。（註8）開封市第四人民醫院建在猶太會堂故址。據《僑園》所載，「上世紀80年代，河南省人民醫院和開封市衛生防疫站在防疫檢查中，對包括張興旺在內的10幾個開封猶太人後裔做了DNA測定，顯示開封猶太後裔與漢族血統融合的傾向，與國外猶太人比較亦不相同。最後得出結論，開封猶太人後裔的血統，是源於伊拉克兩河流域的一支猶太人，還和亞美尼亞猶太人及阿拉伯猶太人比較接近。」（註9）

中國政府的觀點是：儘管古時開封確有猶太人社區，但今天社區已不存在。他們早融入中華民族，身份證上的資料或為漢族或為回族。由於猶太教不在新政府正式認可的5個宗教之列，故猶太團體也不被認可為宗教團體。在開封以外的猶太人世界中，大部份人都不認為「開封猶太人」是猶太人。前者主張要拿出他們的祖先是猶太人的文字證據，才能確認他們的猶太人身份。再者，這些「後裔」不知已有多少代人過著沒有學習猶太教義、沒有奉行猶太崇拜、沒有到過猶太會堂的生活，會堂也已很久沒有拉比。

自1949年以來，宗教信仰在中國已經成為相當敏感的話題，特別是當政府感到外國機構或個人其實是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外國人被禁止在中國傳教；開封市政府從未容許新建（作為常規性宗教崇拜聚會最理想場地的）猶太會堂，也從未容許恢復猶太社區。習近平在2012年11月成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以後，在偏向保守的社會氛圍下，不被官方認可的宗教活動似乎更是難上加難。

隨著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中國重新打開國門，開封市的大門也隨之對外國人「開封」，迎來專門訪尋這具有傳奇色彩的離散猶太僑民後裔的海外猶太人。開初，市政府對來人熱切歡迎，期望藉此吸引外來投資。但來人帶來的不是工廠或研發中心，而是宗教書籍和器物。他們亟亟於向散失已久的弟兄姊妹分享天父的愛，無意念及其他。開封的猶太社區要求被正式確認為「猶太人」，但遭當地政府以不會改變只承認5個官方認可宗教的政策為由拒絕。一些海外猶太人邀請開封同宗移居以色列，其中一位最有名的獲邀者，是生於1947年的張興旺。張是一名退休體育教師、開封市政協委員。他的家滿是猶太教的符飾，包括一個七燭臺（menorah）、一面大衛星（Star of David）旗幟，以及《摩西五經》（Torah）的抄本——張興旺有一猶太名字，正是「摩西」（Moses）。掛在張家牆壁上的，是耶路撒冷哭牆（Wailing Wall）的照片、他和來自以色列貴賓合照的照片等。在週末，他會披著祈禱巾，給圍在身邊的孩子講有關猶太族人傳統和以色列失蹤的10支派的故事。他十分謹慎，生怕被別人說是在傳教；他希望將